

## Research Article

<https://doi.org/10.70731/8tscqr05>

# The Witchcraft of Language: The Belief Basis and Social Control Function of Chinese Folk Abusive Language and Invectives

## 语言的巫术：中国民间诅咒类詈语的信仰基础与社会控制功能

Zhenyu Qin<sup>a,\*</sup>, Zijun Zhao<sup>a</sup><sup>a</sup> 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519040, China**Keywords:**

Curse;  
Invective;  
Verbal Sorcery;  
Folk Belief;  
Folklore;  
Sympathetic Magic

**关键词:**

诅咒; 詈语; 语言巫术;  
民间信仰; 民俗学; 交感巫术

**Abstract:** Curse-based invectives are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deeply embedded in folk daily life.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 extend beyond mere emotional venting to encompass a form of "verbal sorcery" rooted in traditional belief systems, as well as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techniques. Studying them from a folklore perspective can unravel the mystery of why such curses carry strong psychological deterrence and normative pow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ir efficacy is built upon three interconnected belief systems: the faith in the power of spoken words (kotodama), sympathetic magic, and a worldview centered on the netherworld. In terms of function, they participate deepl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within folk communities through three pathways: ethical discipline, conflict medi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By interpreting curse-based invectives as a kind of "linguistic sorcery," this study offers a new micro-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logic of Chinese folk society.

**摘要:** 诅咒类詈语是一种融入民间日常生活的语言现象，其深层运作机制并非只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还包含一套基于传统信仰体系的“语言巫术”以及非正式社会控制技术，从民俗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可解开此类诅咒为何会产生强大心理威慑以及社会规范效力的谜团。研究发现，其效力建立在“言灵信仰、交感巫术、幽冥世界观”这三重相互关联的信仰体系之上。在功能方面，它借助伦理规训、冲突调解与心理补偿这三种途径，深度参与到民间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当中，凭借对诅咒类詈语这一“语言的巫术”进行解读，可为理解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逻辑提供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 1. 引言

诅咒作为一种借助语言为媒介、吁请超自然力量对现实实施干预的言语行为，是深深嵌入中国民间社会肌理之中的一种“活态民俗”，从“天打五雷轰”这种宇宙报应式的说法到“断子绝孙”这类宗族惩戒性的言辞，诅咒类詈语并非仅仅是单纯的情绪发泄，其背后隐含着一整套完整的“语言巫术”逻辑。它是民众世界观与信仰的微观呈现，也为理解民间社会非正式控制机制提供了关键的切入点，本文基于民俗学对“生活文化”的关注，系统剖析中国民间诅咒类詈语的信仰基础与社会控制功能，以此贯通“语言

—信仰—社会”的三维分析链条，为解读民间社会的文化逻辑与运行规则提供一个全新的微观视角。

过往的相关研究为这一课题构建起了多维度的基础框架，也暴露出了一些急需填补弥合的理论缝隙。首先，在语言学与语用学视域下，研究呈现出“形式精微”而“信仰脱嵌”的特点。魏雪（2022）对“X你个N”句式反驳功能的精妙分析，揭示了其作为话语策略的互动效能；张谊生（2010）勾勒的骂詈语词汇化与构式化路径，则呈现了其历史生成的语法轨迹。然而，此类研究长于剖析语言的形式与功能，却普遍悬置了其力量来源的本体论追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1239969690@qq.com](mailto:1239969690@qq.com)

问——为何“不得好死”等诅咒能产生远超普通冒犯的心理震慑？其语言效力所依托的信仰根基始终处在尚未触及的区域。

继而，在民俗学与宗教学领域，学者们直指“语言魔力”的核心，但有着“重仪式而轻日常”的现象。黄涛（2006）对咒语、祷词与神谕的经典区分，为本研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透镜，明确指出咒语源于原始的语言灵力崇拜。赵宏勃（2008）对唐代语言巫术的考据，以及廖玲（2010）对彝族诅咒巫术的社会功能考察，均证实了诅咒信仰在民间社会的实在性。这些研究大多着重关注制度化、仪式化的咒语，然而对存在于日常口角以及邻里纠纷之中的诅咒类詈语这种生活化巫术，缺少深入的学理解析，并且也没有将它有效的信仰体系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功能进行有机的联系。

此外，社会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则提供了丰富的阐释背景，但往往“静态描摹有余，动态机制不足”。孟昭水（2006）将诅咒类詈语明确归因于原始语言崇拜，李娜（2010）通过詈语变迁勾勒了文化心理的流变图景。而余杰（2020）对《摩诃婆罗多》中诅咒叙事功能的精彩分析，则展示了跨文化比较中诅咒作为情节驱动力的普遍性。这些研究敏锐地捕捉到诅咒作为文化符号的意涵，却大多将其视为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未能充分揭示其作为能动的社会实践，如何积极参与社会秩序的建设、维系与争夺。

鉴于此，本文尝试突破现有研究在学科方面存在的界限以及视角上的限制，主要聚焦于对以下问题做出回应：首先从信仰角度来看，中国民间诅咒类詈语作为一种“语言巫术”，它的超自然威慑力究竟是基于怎样一种系统性和层级性的信仰体系呢？其次在实践方面，这样一套信仰与实践内容，是如何在微观的民间社会互动当中，具体发挥其作为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的能动职能？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展开探讨，一方面是为了填补“日常诅咒”这一理论方面的空白，另一方面也是尝试达成从静态的文化符号描述到动态的社会机制分析的理论层面的跃升。

为达成上述目标，本文拟构建一个涉及“信仰基础 - 行为表征 - 社会功能”的整合性分析架构，在方法运用上，会采取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一方面，全面梳理古典文献、地方志以及民间文学作品里的诅咒案例，展开类型学剖析。另一方面，参考历史民族志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当代田野访谈，期望在具体的社会

文化环境中，验证并深化文本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实现历史深度与现实鲜活感的融合。

本文的创新价值具体表现为：在理论框架方面实现创新，首次把散点式的民间诅咒实践明确提升到“语言巫术体系”的高度来进行系统阐释，清晰明确了其包含“言灵信仰、交感巫术、幽冥世界观”的三重信仰内核。其次是研究视角取得突破，把诅咒重新定义成一种积极的社会控制技术，从“伦理规训、冲突调解、心理补偿”这三个维度，动态剖析其参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实践逻辑，研究对象得以拓展与深化，将学术目光从神圣性的仪式咒语，有力地转向更具普遍性的日常生活言语实践，推动民俗学研究更紧密地贴近民众的真实生活世界。

## 2. 诅咒类詈语的民俗特征与信仰内核

诅咒类詈语属于深嵌于民间生活的“活态民俗”，它的生成以及传播遵循特定的文化逻辑，这种语言现象有着鲜明形式特征，还凝结着深厚信仰内涵，二者共同构成其作为“语言巫术”的实践体系，这部分内容要系统解析诅咒类詈语在语言形式方面的仪式化特征以及核心母题类型，接着挖掘其背后的信仰根基，以此为理解其社会控制功能奠定理论基础。

### 2.1. 作为“神秘套语”的语言构式与仪式特征

诅咒类詈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形成了稳定的“神秘套语”体系，其语言构式呈现出鲜明的仪式化倾向，具体体现在结构固化、修辞巫术化与语境适配性三个层面。

#### 2.1.1. 结构固化，作为力量容器的程式化套语

诅咒类詈语大多是以固定套语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像“天打五雷轰”“断子绝孙”“X你X”等此类表述，它们的词汇组合以及句式结构呈现出高度稳定性和传承性，而这种固化现象，实际上是深深根植于民间对于语言形式神秘力量的信仰之中。黄涛（2000）在对河北黄庄巫医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施术者将咒语视为法术的核心，严格保密且不容更改，认为固定的语言形式是保证巫术效力的关键。在日常诅咒行为中，那种对于固定表达的坚守，实际上就是原始语言崇拜在世俗层面的延续，而固定套语作为一种文化方面的共识，它可快速地向听者联想到特定惩罚所带来的后果，就像“绝户”这个词在中原地区，会直接让人想到宗族传承中断这一关键的文化焦虑，无需额外解释即可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慑。

### 2.1.2. 修辞巫术化，交感思维的言语实践

诅咒类詈语所采用的修辞策略，深刻地呈现出交感巫术的思维模式。在韵律层面，大多时候运用短促且有力的句式以及对仗押韵的结构，就像“男盗女娼，断子绝孙”这样的表述，借助节奏的强化来模拟仪式咒语的念诵效果，以此提高语言的感染力和强制性（于灵子，2006）。在修辞格的运用中，依据“相似律”，借助夸张的手法去描绘恐怖的灾难场景，像“死无全尸”以及“万劫不复”这样的表述，期望在现实当中引发与之相似的效果，按照“接触律”，依靠比喻把被诅咒者与低贱生物联系起来，例如“狗杂种”“鳖孙”等说法，想要达成负面属性的转移以及人格的贬损（孟建安、柳金殿，1997）。此外，部分诅咒会采用委婉策略，比如用“不要脸”来指代作风问题，这种方式契合社会禁忌，又借助言外之意的联想，使诅咒的语义空间得到拓展，呈现出民间言语艺术的复杂特性。

### 2.1.3. 语境适配，社会规约下的策略性运用

诅咒类詈语在使用的时候并非随心所欲，也会受到严格的社会规约的限制，呈现出高度的与语境相适配的特性。孟建安与柳金殿（1997）对中原地带的研究表明，诅咒的选择与使用者的性别、辈分、文化修养及具体情境密切相关。例如长辈对晚辈时，会用像“兔崽子”这类带有亲缘贬斥意味的詈语，相反的情况却极少出现，男性大多会使用较为直白的性詈语以及暴力诅咒，而女性往往更倾向于采用相对委婉的诅咒方式，或者选择转向其他方式进行诅咒，这样的差异充分体现出社会角色以及权力关系对言语行为有着极为深刻的塑造作用<sup>1</sup>。本质上，语境适配性实际上是民间对“语言魔力”所形成的一种社会调控机制，其作用在于保证这一危险性的“言语武器”可在一定的社会规范范围之内运用，一方面可为个体的情感宣泄以及冲突解决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还可以维持群体交往的基本秩序。

## 2.2. 诅咒的母题类型及其文化逻辑

诅咒类詈语的内容围绕传统社会的核心恐惧与价值观念，形成了体系化的母题类型。这些母题不仅是诅咒的语义核心，更是洞察其文化逻辑与信仰基础的关键。

### 2.2.1. 超自然报应母题，幽冥世界的终极审判

这个母题借助召唤天神、雷电、阎王这类超自然力量来对被诅咒者施加惩罚，像“天打雷劈”“遭天谴”这样的表述就是例证，其效力是构建在民间深厚的“幽冥世界观”之上。赵宏勃（2008）基于《太平广记》的研究指出，唐代民间普遍相信语言巫术可以沟通并驱使超自然力量。这类诅咒在结构中模拟了司法审判的流程：诅咒者作为原告，超自然力量充当法官与执行者，而诅咒语本身就变成了启动审判的“诉状”，当世俗社会的正义没办法得到伸张之时，这个母题为弱者提供了寻求“终极正义”的一种象征性途径，它的威慑力来源于社群对于超自然秩序的共同信仰。

### 2.2.2. 血脉断绝母题，宗法伦理的致命一击

以“断子绝孙”为典型代表的这一母题，直接命中了血脉传承这一宗法社会的关键核心。其巨大的心理杀伤力源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族伦理（孟建安、柳金殿，1997）。从巫术逻辑层面理解，不难发现其巧妙地运用了“接触律”这一原理，借助诅咒子孙后代的方式来对行为者本人实施惩罚，以此达成代际牵连的效果，在传统社会的情境之下，个体所有的生命意义紧密地融入到家族绵延的序列之中，血脉一旦中断，便意味着社会性死亡以及祖先祭祀活动的终结。因此，此母题常被用于惩戒严重违背家族伦理的行为<sup>2</sup>，成为维系宗族秩序的有力言语工具。

### 2.2.3. 身后世界母题，死后境遇的永恒惩罚

此母题专注于诅咒对方死后的境况，如“死无葬身之地”、“永世不得超生”等。它融合了佛教的轮回观、道教的地狱观念及民间魂魄信仰（陈艺鸣，2007），构建了一个充满痛苦的“死后世界”。于灵子（2006）指出，民间对死亡及相关词汇存在大量禁忌，正反映了对身后世界的敬畏。该母题则反向利用这种敬畏，借助语言的魔力把被诅咒者打入万劫不复的死后困境，如此一来，惩罚的时间维度得以延长直至永恒，并且赋予了诅咒一种超脱现世的、有形而上意义的道德审判意味。

<sup>1</sup> 男性骂詈时多用性器官加对方亲长进行攻击，女性则较少使用。

<sup>2</sup> 如不孝、乱伦。

### 2.2.4. 身体灾病母题，现世苦难的具象投射

此母题诅咒对方或其亲属遭遇疾病、伤残等生理痛苦<sup>3</sup>，其思维基础是交感巫术的“相似律”。黄涛（2000）阐释，初民在巫术仪式中通过语言描述成功或失败的景象，以期影响现实。同理，诅咒者通过详尽描绘病痛与伤残，在语言层面完成了对他人身体的攻击。该母题的普遍性，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对身体健康的高度依赖，以及对生理残缺的社会性恐惧与歧视<sup>4</sup>。

### 2.3. “语言巫术”信仰的三重根基

诅咒类詈语的威慑力，归根结底源于一套完整的“语言巫术”信仰体系，此体系由三重相互关联的信仰共同构成。

首先，言灵信仰——语言本体力量的崇拜。这是最原始的信仰根基，即认为语言本身具有创生与改变现实的神秘力量。在神话思维中，语词（逻各斯）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和秩序的决定者。

第二，交感原理——巫术思维的内在逻辑。诅咒的运作机制遵循弗雷泽所归纳的“相似律”与“接触律”。民间相信，通过语言在概念世界建立联系，就能在现实世界引发相应的变化。

其三，幽冥世界观与果报观念——超自然秩序的保障。诅咒的有效性，最终需要一个能够执行其判决的超自然秩序作为保障。中国民间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天道”、“承负”、“因果报应”观念，为诅咒提供了终极的“执法者”与道德合法性。

诅咒类詈语借助仪式化的语言结构，承载着涉及生命、宗族以及宇宙秩序的体系化母题，并且扎根于一个由言灵信仰、交感逻辑和幽冥世界观共同构成的三重信仰基础之上，这样一个完整的“语言巫术”实践体系，为其履行社会控制功能赋予了内在的、基于集体无意识认同的心理威慑力量与文化合法性，这部分内容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探讨。

## 3. 诅咒类詈语的信仰根基，“语言巫术”的构成体系

诅咒类詈语的心理威慑力以及社会规范效能，并非源自其字面呈现出的粗鄙之意，而是深深扎根于一套被

民间社会共享的、有系统性特点的“语言巫术”信仰体系当中，这个体系不是简单的单一观念的混杂，而是一个有着严密层级结构的体系，它由信仰内核、运作逻辑以及价值秩序共同构成。这三者之间相互紧密关联，共同给予日常诅咒一种超自然的权威，让其成为一套对民间观念与行为有着深刻影响的文化编码。

### 3.1. 信仰内核：“言灵”信仰与语言的本体性力量

诅咒效力的最深层根基，在于对语言本体性力量的崇拜，即“言灵”信仰。它坚信语言并非被动指涉现实的符号，而是能够直接干预，甚至创造现实的本体性力量。

#### 3.1.1. 语言与存在的同一性

此种信仰由原始思维里“名实不分”的认知模式发展而来，如于灵子（2006）所指出的那样，在原始信仰当中，语言讲出的概念就是物质自身，这种思维在民间社会沉淀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发出一个诅咒，那就如同启动了一次超自然攻击。黄涛在黄庄所做的田野调查为此给出了鲜活的例证：巫医坚信“主要是咒管事”，咒语的力量独立于神灵，它本身就是疗愈或者伤害的源头。这正是“言灵”信仰在当代的遗留，语言被赋予了可直接作用于客观世界的效能。

#### 3.1.2. 禁忌与口彩，信仰的双向验证

民间广泛存在的语言禁忌与口彩习俗，从正反两面巩固了这种语言魔力信仰。对“死”、“碎”等不祥字眼的避讳，源于对语言会“招致”灾祸的恐惧；而对“福”、“寿”等吉祥语的偏爱，则是对语言能“引来”福祉的期盼（于灵子，2006）。这套“趋吉避凶”的日常语言实践，与诅咒类詈语共享着同一套元逻辑：语言与吉凶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链。因此，诅咒的本质，是对语言魔力的一种反向运用，通过主动发出不祥之语来“召致”灾祸。禁忌与诅咒，一避一攻，共同构成了语言魔力信仰的闭环证据。

### 3.2. 运作逻辑：交感巫术的原理与诅咒的实践机制

倘若“言灵”信仰是驱动诅咒的“引擎”，那么交感巫术便是其精准命中目标的“导航系统”。弗雷泽所归纳的“相似律”与“接触律”，为诅咒提供了具体而微的实践逻辑。

<sup>3</sup> 如“瞎眼瘸腿”、“生孩子没有屁眼”。

<sup>4</sup> 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劳动力基础。

### 3.2.1. 基于“相似律”的模仿性诅咒

“相似律”即“同类相生”，通过模仿预期结果来引发该结果。诅咒大量运用此原理，通过语言在概念层面“预演”灾难，以期在现实中触发它。无论是描绘天降雷霆的“天打五雷轰”，还是刻画身体残缺的“瞎眼瘸腿”，都是通过语言的逼真模拟，借助巫术思维将语义层面的伤害转化为实在的惩罚。这与黄涛（2000）所观察到的收魂仪式中“呼唤-回归”的模仿逻辑如出一辙，是初民“通过控制符号来控制现实”这一思维模式的延续。

### 3.2.2. 基于“接触律”的关联性诅咒

“接触律”认为，事物一旦接触，其影响便持续存在。诅咒通过关联与被诅咒者密切相关的关键他者，实现对主体的间接惩罚。“断子绝孙”关联其子孙，“祸及祖宗”关联其先人，其威力在于利用宗族社会中最核心的纽带，将惩罚的痛苦放大并扩散。这类诅咒与道教“承负说”中祖先之过流及子孙的观念（王月清，1998）形成互文，使得诅咒的效力能跨越代际，形成一种基于血缘的、强大的伦理约束力。

## 3.3. 价值秩序：幽冥世界观与果报观念的终极保障

语言魔力与交感巫术若缺乏一个宏大的宇宙论框架为其背书，其威慑力将大打折扣。中国民间融合了佛道思想的幽冥世界观与果报观念，正为此提供了终极的价值保障与神圣秩序。

### 3.3.1. 三重世界的司法空间

民间信仰中的“天神-人间-地狱”三重世界，为诅咒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超自然司法场域。赵宏勃（2008）对唐代语言巫术的研究表明，民间深信存在一个可以经由语言沟通并驱动的超自然秩序。诅咒中的“天打雷劈”是诉诸天神的审判方式，“打入十八层地狱”则是启动阴司的刑罚手段，如此一来，诅咒的惩罚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短暂的现世，而是延伸到死后的永恒以及来生的轮回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其威慑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维度。

### 3.3.2. 果报观念的伦理闭环

佛教的“因果报应”与道教的“承负”思想，共同铸就了“善恶有报”的民间道德铁律。诅咒类詈语在内容上高度契合此律，常针对“不孝”、“背信”等公认恶行，从而使诅咒者扮演了“代天行罚”的道德法官角色。其中慧远大师的

“三报论”（现报、生报、后报）为解释现实中的报应失灵提供了理论工具：现世不报，只因时候未到，惩罚将在来生或后世必然显现。这套精密的果报时间学，为诅咒的终极有效性提供了无懈可击的伦理闭环，使其在民间心理中获得了坚不可摧的合法性。

因此诅咒类詈语的信仰根基是一个层层递进的严密体系，“言灵”信仰提供了力量的本源，交感巫术设定了作用的路径，幽冥世界观与果报观念构筑了终极的价值与秩序保障，这三者共同把粗鄙的骂詈之言，提升为一套基于深层文化心理、有着强大规范效力的“语言巫术”体系。

## 4. 作为社会控制机制的诅咒

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里，诅咒类詈语构建起了一套以“语言巫术”信仰为基础的非正式控制机制，借助独特的文化逻辑以及象征实践，它于维系伦理秩序、调节社会冲突以及平衡心理权力这三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正式制度之外颇具效力的民间治理手段。

### 4.1. 伦理秩序的民间规训与维系

诅咒的核心功能在于它是一套植根于民俗的道德话语，对传统社会的核心伦理规范进行着持续的影响与强化。

首先，诅咒所涉及的内容与儒家伦理的负面清单直接相关，不管是违背伦理道德方面的詈语，还是涉及宗族以及性方面的詈语，它们的攻击目标都高度一致地针对“不孝”“无后”“血统不纯”“通奸”等行为，“断子绝孙”这一表述直接命中宗法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核心焦虑所在。“杂种”“婊子养的”等话语则是对家族血统纯正性进行了恶毒的否定，诅咒所有的“威力”来源于它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向强化，当社会成员违反这些规范时，来自周遭的诅咒就会形成强大的道德舆论压力。

其次公开的诅咒骂詈行为构建起一种民间道德审判仪式，“骂街”作为公开表演，会形成强大的社区舆论压力，在这一仪式里，诅咒者以道德卫道士身份，借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把越轨者“罪行”公之于众，此过程惩罚具体当事人，还是面向全社区有关“善恶有报”的动态演绎。如李娜研究所表明的，在缺乏正式法律途径或对官方正义缺乏信心的语境下，公开辱骂成为弱者寻求“天理”和“公道”的替代性途径。

## 4.2. 社会冲突的“安全阀”与替代性正义

在充满张力的社会结构里，诅咒骂詈充当了社会冲突的“安全阀”角色，借助制造舆论的方式，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调节机制。

一方面，下层民众面对不公平现象时，大多时候没有快速的反抗方式和途径，而诅咒为弱势群体给予了低成本宣泄手段，对于那些在现实中无力反抗的人而言，诅咒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反抗以及权力幻象，借助语言上的攻击和侮辱，他们在精神层面获取到短暂的优势，疏导现实中的愤懑与无力感。这种心理代偿机制，在客观上规避了更激烈的社会对抗。

另一方面，诅咒是制造舆论、进行社会批评的武器。骂詈行为具有以语言报复为目的的动机。当这种行为在公共空间展开时，便超越个人恩怨，转化为公众舆论。对于为富不仁者、仗势欺人者，来自民间的诅咒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监督。黄涛（2000）对咒语灵力信仰的论述，从信仰层面解释了这种舆论威慑力的来源——人们相信那些恶毒的诅咒之言，因其符合“天理”，可能借助超自然力量实现。

## 4.3. 弱势群体的心理补偿与权力幻象

诅咒另一深层功能，在于它为权力结构中的弱势方提供了心理补偿，并帮助使用者建构一种象征性的权力。

在心理层面，诅咒实现了从现实无力到象征性主宰的转换。王燕（2005）的论述尤为精辟，她指出在宗族与性骂詈中，女性常常是被侮辱的对象，这套话语体系本质上是“男人之间的战争”。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在冲突中也会主动运用这套男权话语，这虽说属于一种无奈的行为举措，不过至少在语言这一层面可在短时间内获取到一般由男性所把持的“话语权”。

在象征层面，诅咒骂詈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宣示。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载体。当一个人敢于对他人施加诅咒时，他/她便在语言层面上将自己置于一个更高的、能够评判并惩罚对方的位置。孟建安（1997）提到，人们根据自身角色身份选择不同的骂詈，恰恰说明了诅咒话语中蕴含的精密权力关系。借助对这套话语的运用，个体可在象征秩序里重新确定自身的位置，获取到某种形式的主体性以及掌控感。

<sup>5</sup> 如“天打五雷轰”。

<sup>6</sup> 四大核心母题：超自然报应、血脉断绝、身后世界、身体伤残。

因此，中国民间的诅咒类骂詈，通过其特有的方式介入社会运行。它既是维护伦理纲常的“民间法官”，又是疏解社会压力的“安全阀门”，同时还是弱势者进行心理抗争的“符号武器”。正是通过这些功能的交织，诅咒这一看似粗鄙的语言现象，深刻地参与了传统民间社会的整合与控制。

## 5. 巫术的祛魅与民俗的遗存

本文通过对中国民间诅咒类骂詈开展民俗学的剖析研究，揭示出这类骂詈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暴力，实际上是一套基于传统信仰体系之上，并且可以有效参与到社会控制环节的“民俗制度”，它恰似一面棱镜，从中可以折射出民间社会所有的宇宙观、伦理秩序以及权力运作的微妙逻辑。

### 5.1. 研究结论

本文的核心发现可归结为以下三个环环相扣的层次：

从信仰层面而言，诅咒构建起了一套借助“语言巫术”的效力体系，其心理威慑源自“言灵”信仰、交感巫术原理以及幽冥果报观念这三重支撑。“语言魔力”来源于原始人对自然的畏惧，他们把语言看作等同于客体本身，正是这种将语言实体化的原始思维，赋予了诅咒“以言致祸”的超自然特性，并且依靠相似律与接触律的巫术逻辑，让其攻击可精准地指向目标及其关联物。

从行为层面来看，诅咒借助仪式化的语言以及类型化的母题，达成了信仰的具象化表达效果。固定的诅咒套语<sup>5</sup>和四大核心母题<sup>6</sup>，共同构成了一套稳定的文化符号系统。这套系统不单单是恐惧情绪的一种宣泄，更是对传统社会核心价值，如宗族延续以及血统纯正等方面进行反向强调和维护。

就功能层面来说，诅咒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借助三条途径维系着民间秩序的运行，它扮演着“民间法官”的角色，可惩戒越轨行为并强化伦理规范。它还是“安全阀”，可疏解社会情绪并提供替代性正义。它也是弱势群体用于进行象征性权力争夺以及获取心理补偿的“符号武器”。王燕（2005）与孟建安（1997）的研究分别从话语权力和社交动机的角度，为此提供了深刻的佐证。

## 5.2. 现代转型与理论启示

步入现代社会之后的诅咒类詈语，它所处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呈现出一种信仰逐渐消逝，但功能依然遗存的复杂状况，而这一转变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启示。

首先，其信仰内核在理性化与世俗化的浪潮之下急剧衰落，不过语言形式以及社会功能却在新的语境里寻觅到了存续空间，科学世界观把“语言魔力”的神秘性消解，宗法社会的解体将其赖以生存的伦理土壤给抽离。然而还有不少人使用诅咒语纯粹是因为习惯，其伤害力源自情感冲击而非对超自然惩罚的恐惧。在网络空间以及社会交往当中，诅咒词汇演变成了情绪化的标签以及批判性的修辞<sup>7</sup>，其宣泄情绪、表达抗议的核心功能被保留下来并且放大了，只是脱去了巫术的外衣。

有趣的是，诅咒的演变同样遵循此路径。它从一个主动行使、深信其能干预现实的“巫术实践”，逐渐转变为一种更多需要被规避、主要承担情绪宣泄功能的“语言禁忌”与“文化惯性”。这一从“主动施咒”到“被动避讳”的变迁，正是韦伯所谓“世界祛魅”在语言民俗领域的微观体现，深刻地映射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神秘主义消退、工具理性主宰的宏大历史进程。

##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亦存在一些局限，在构建宏观框架时，对于不同方言区以及族群里诅咒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挖掘不够充分，对于诅咒在现代社会，网络环境中的生态状况，缺少系统性的实证调查以及量化分析，从历史维度而言，对诅咒从古至今的演变脉络以及动因的梳理还比较薄弱。

未来的研究可沿以下方向深化：着手开展精细化的区域比较研究工作，深入剖析地域文化模式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塑造诅咒的方言特色以及社会功能的，借助数字人文以及网络民族志方法，针对新媒体当中的诅咒现象展开追踪，揭示出其传播动力学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开展贯通古今的历时性研究，清晰地勾勒出其演变轨迹，并且将其与社会结构变迁，如法治进程、家庭变革等进行关联分析。

诅咒类詈语这门古老的“语言巫术”，正逐渐从信仰的高地退至文化的平原，对其展开研究，不只是为了留存

一份即将消失的民俗记忆，是要透过它，去理解我们的文化怎样从往昔敬畏语言魔力的状态，迈向如今崇尚工具理性的阶段，它身为一块珍贵的“文化活化石”，会持续讲述有关权力、秩序以及人类情感表达的永恒故事。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魏雪. “X你个N”的反驳功能及相关问题[J]. 汉语学习, 2022, (06):69-76.
2. 余杰. 诅咒的情节功能: 史诗《摩诃婆罗多》叙事艺术研究[J]. 外国文学, 2020, (03):60-71. DOI:10.16430/j.cnki.fl.2020.03.007.
3. 苏荟敏. 咒语的文化心理功能分析[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4):51-56.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18.04.007
4. 张启睿, 李馨. 汉语詈语的概念结构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03):93-102.
5. 苗宇, 杜冰研. 人际冲突中的挑衅话语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6):169-173.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6.032.
6. 郭慧玲. 众神相争的诅咒——宗教对话的核心边缘模式[J]. 世界宗教研究, 2011, (04):5-13.
7. 江家宝. 骂辞的行为信息——骂詈语言的语用学研究[J]. 江淮论坛, 2011, (04):188-192+187. DOI:10.16064/j.cnki.cn34-1003/g0.2011.04.006.
8. 黄玲. 言语禁忌抑或再生咒语——兼与万建中教授商榷[J]. 民族艺术, 2011, (01):66-71+123. DOI:10.16564/j.cnki.1003-2568.2011.01.004.
9. 廖玲. 论彝族民间诅咒巫术[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0, 29(06):230-231.
10. 张谊生. 试论骂詈语的词汇化、标记化与构式化——兼论演化中的骂詈语在当代汉语中的表达功用[J]. 当代修辞学, 2010, (04):1-13.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0.04.011.
11. 李娜. 从詈语的使用看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J]. 求索, 2010, (01):57-59.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0.01.003.
12. 赵宏勃. 《太平广记》中的语言巫术及唐代民间信仰[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 (11):101-106.
13. 江志全, 范蕊. 汉语性詈语的心理及文化分析[J]. 青海社会科学, 2008, (03):192-195. DOI:10.14154/j.cnki.qss.2008.03.030.
14. 陈艺鸣. 从《红楼梦》咒死詈语看人们的多元信仰文化[J]. 新余高专学报, 2007, (02):46-48.
15. 黄涛. 咒语的本源、演变、基本特征以及与祷词、神谕的区别[J]. 宗教学研究, 2006, (03):160-165.
16. 于灵子. 语言魔力与中国民俗文化[J]. 理论界, 2006, (09):100-101.
17. 朱咏. 佛教因果报应论及其文化内涵[J]. 中国宗教, 2006, (08):34-36.
18. 孟昭水. 汉语詈语的致骂方式及文化内涵[J]. 齐鲁学刊, 2006, (04):77-81.
19. 黄涛. 咒语、祷词与神谕: 民间信仰仪式中的三种“神秘”语言现象[J]. 民间文化论坛, 2006, (02):39-44. DOI:10.16814/j.cnki.1008-7214.2006.02.011.
20. 张树国. 祝辞系文学与《诗经》时代的言灵信仰[J]. 齐鲁学刊, 2005, (04):60-65.
21. 王燕. 宗族及性詈语的文化阐释[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sup>7</sup> 如，卧槽、他妈的等。

- 版),2005,(02):37-39.
22. 黄涛. 咒语灵力信仰的形成机制[J].民间文化,2000,(07):25-28.DOI:10.16814/j.cnki.1008-7214.2000.07.007.
  23. 王月清.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01):60-67.
  24. 孟建安,柳金殿. 咒语与社会文化[J].修辞学习,1997,(05):44-45.DOI:10.16027/j.cnki.cn31-2043/h.1997.05.029.
  25. 马学良,李耀宗. 论民俗语言[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05):70-82+38.DOI:10.15970/j.cnki.1005-8575.1994.05.017.